

中国现代革命史 人物研究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吴家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人物研究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吴家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3 插页2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25 000 册数: 1—3500

*

ISBN 7-300-01017-7

K·100 定价: 5.35元

前 言

丰富、准确、翔实的历史资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的堆积，既不是重现历史，也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一个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革命史、党史工作者的任务，应当是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透过历史事件纷繁的演进，各类人物多彩的活动，找出历史变化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在，预测将来，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我室中共党史学副教授吴家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自从1978年至今，已发表了现代史、党史研究、文章百余篇；主编与合著有《中共党史简明教程》、《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研究论集》、《北京现代革命史》以及《中国国情与北京市情》等著作。

吴家林同志对中国现代史人物的活动、思想的研究很有特色，今将其中的24篇结集出版，以纪念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先烈，纪念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这本文集中除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外，有与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革命博物馆袁钟秀同志合作撰写的论文；有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了青年学者侯且岸、谢荫明同志的大力帮助；文集按人物的思想研究、革命活动、传记和年谱四部分进行编排。部分文章曾在杂志、刊物上登载过，这次出版做了大量的修改，不再注明转载，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党史人物研究专家彭明教

授的支持，他在百忙中，抽时间审阅了部分文稿并写了序言；本书责任编辑陈德义同志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序言	彭 明..... (1)
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3)
从《甲寅日刊》看李大钊的早期政治思想	(19)
试析李大钊的法制思想及其活动	(29)
李大钊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6)
略论李大钊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56)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	(70)
论彭湃革命思想的发展	(81)
彭湃的教育思想初探	(95)
试论邓中夏的早期工运思想	(107)
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贡献	(122)
施洋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40)
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146)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	(173)
高君宇在北京的革命活动	(192)
邵飘萍与《京报》	(201)
七七事变前后的宋哲元	(209)
王若飞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主要功绩	(223)

赵世炎传	(233)
马 骏传	(253)
蔡和森传	(261)
邓中夏传	(275)
王若飞传	(293)
李大钊年谱	(306)
彭湃年谱	(350)

序 言

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人物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历史是由有意识的人创造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因此，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史学，还是世界史学，都非常重视对人物的研究。司马迁的《史记》共130篇，其中10表、8书、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就是说：人物传记占了112篇。人物传记，往往是溶历史事件、社会风貌、人物思想品格为一体，是历史著作中最具可读性、趣味性的一种体裁。

在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研究中，对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既可以研究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领袖人物，也可以研究革命中的平凡人物。通过研究人物的思想、活动、精神风貌，能够深化和丰富我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人物研究，必须坚持“真实、具体、生动”的原则。所谓真实，就是实事求是，不能拔高，不能臆造。具体是历史学的要求，防止一般化。一旦具体地反映人物的本来面貌，就会生动起来。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物的深入研究始终没有真正活跃起来，在“左”倾思想的束缚下，神化个人，使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脱离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事求是的原则，对一般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公式化，无法生动、具体地展现人物的思想、个性。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放在应有的重要的地位上。

吴家林副教授在长期的党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深刻体会到人物的研究对历史科研和教学极为重要，在他教学工作的同时，对现代革命史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人物逐一地进行深入研究，或写传记，或作年谱，或分析思想和实践。因此，在期刊、报纸上，他的作品多次得以发表。这次收入本书的24篇文章，涉及13位历史人物，包括革命的先驱者、人民的领袖、政治思想家、军事家等等。

吴家林同志既重视研究人物的思想，也重视考察人物的活动，从而对他研究的人物有一个全面的剖析。同时，他还留意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试图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他笔下的人物立传、编年谱，从而把人物研究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方面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意使用档案、事件和报刊资料，并重视调查研究，不轻信孤证；态度是严谨的，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这点说起来似乎容易，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应当肯定的。

当然，这部人物研究专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有的人物研究得多而深入，有的人物则显得单薄一些。还有，对较高层次的人物研究多，对较低层次的人物挖掘少。这对整个近现代革命史人物研究来说，是有待加强的。我们有责任挖掘出更多的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和起过不同作用的历史人物，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业绩，以更好地丰富历史，教育后人。

彭 明

1990.8.21.于北戴河

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起，就忧国忧民，追求救国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战斗洗礼，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12月，他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坚贞不渝，奋斗终生，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从8岁起就开始从事田间劳动，从小目睹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憎恨地主、官僚，同情劳动人民。他在读书期间就喜欢歌颂劳动人民智慧、反抗专制和强暴的《水浒传》、《西游记》和揭露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红楼梦》等古典小说。13岁的毛泽东在读书的过程中，曾考虑过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他说：“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①后来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了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②。年幼的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他发现历史和现实一样，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他十分憎恨这种不平等。他开始有了朴素的平等观。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少年毛泽东读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作者积极主张改革封建专制，实行资本主义议院制，兴办教育，振兴实业，以图国家的富强。在作者看来，“中国之所以弱”，之所以被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③，促进中国强大起来。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他从中了解到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受列强欺侮的历史，感受到许多爱国志士努力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奋斗精神。这本书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促进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接着他接触康、梁的维新思想，崇拜维新运动的领导人。

1911年初，毛泽东考入湖南的湘乡中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毛泽东接触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在革命潮流的鼓舞下，毛泽东写了一篇政治论文，贴在学堂墙壁上。但是此时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崇敬，还弄不清孙中山的革命派和康、梁改良派之间的差别。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爱国的，都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的人，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毛泽东当时并不反对君主立宪制。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他说：“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①毛泽东在这篇政治论文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样的设想，只能说明毛泽东爱国心切和思想含混而已。

在辛亥革命期间，毛泽东毅然剪下了头上的辫子，参加了革命新军；南北议和后，他决定退出军队，回到早先的书本生活之中。他从实际斗争中感觉到要救中国，必须进一步寻求救国的真理。从这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进化论。在长沙半年的自修期间，他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此前后，他还读了许多世界历史和地理书，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并醉心于西方哲学研究。他从宋明理学到王船山的唯物论，从康梁改良主义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的革命思想，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都有程度不同的学习和研究。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曾经这样描绘：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②

毛泽东同其他先进分子一样，在追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思想上呈现着极其复杂的状况。然而，在1918年上半年前，他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25页。

二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他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经历着许多社会思潮的洗涤，从而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他打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特别是在李大钊手下当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以后，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他便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这时在他整个思想中，共产主义思想还只是初步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仍是主导的，同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也占有相当地位。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是他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重要著作。他在文中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并根据俄国革命经验，主张国内工人农民和其他平民实行革命大联合，以反抗贵族、资本家的联合，从而建立“劳农委员会政府”。他还乐观地预计，“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就在这篇文章中，民主主义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甚至还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

在社会历史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谁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有为祖国和人民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而且必须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求，这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不能设想，一个思想保守和怀抱偏见的人，或一个只想当鉴赏者并无决心为人民献身的人，看了一两本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就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思想状况和革命经历上去找原因。在他的思想中确已有许多积极因素，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思想上已经掌握了唯物论、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从

整体上说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受近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而且受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王船山、谭嗣同、孙中山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文章的辩证观点的启示。在1917、1918年上半年，他力图运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他的唯物思想、辩证观点，主要反映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和《体育之研究》这两篇著作中。

毛泽东认为，“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其存者也”。因此精神不灭是以物质不灭为基础的，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

他又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他运用辩证观点和唯物思想来解释德智体三者关系，强调体是德智的基础，离开基础的体，德智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一意义上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他还说，“美学未成立以前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真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这就是说任何观念，心灵都是反映客观实体；任何著述、画面都是对自然的钩画和叙述。一句话，思想、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任何经验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就有的。他在批语中指出：“此种言语在其起源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吾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而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诏先天识觉也。”在此对于经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与唯心主义先验论划清了

界限。

毛泽东还认为，一切事物都由矛盾构成。“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又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生与死，成与毁都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他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又促进事物向着相反方向转化。“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也犹有改易官骸之效。”身体强壮的不锻炼可以变为体弱者；相反，体弱者“勤自锻炼，遂变为强矣”。

毛泽东指出，宇宙万物、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向前发展，永远毁旧得新。“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又说：“吾人揽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宇宙物质是永远不灭的，人类社会总是在乱治中向前发展。正是这些唯物的发展观点，鼓舞着青年毛泽东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使他在困难面前不气馁，在挫折面前不灰心，对祖国前途和革命事业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

上述基本观点，有利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下来。

二、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发生了怀疑。事物发展永远是不平衡的。当西方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和进化论已经过时的时候，东方的革命者却拿起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旗子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给予中国革命以正确思想指导的是人类最先进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以前，马克思主义未能够广泛传播，进

化论曾是中国进步思想的主流。它用“物竞”和“天择”的生物发展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并认为进化是任何事物不可避免的规律，完全适用于任何种族和社会。这样种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谁胜利谁生存，谁失败谁灭亡。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却对中国人民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起过警觉奋起的作用。

资产阶级曾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青年毛泽东曾经信仰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过进化论思想，并且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不过，他在政治上仍然向往欧美政治制度的同时，却又明确提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的论断。他主张西方思想的“几多部分”，主要是指进化论和民主主义思想，“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又说，“那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为仙境”。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的事情。

毛泽东对于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否定，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主张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科学，是被压迫人民起来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人，才能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从而能真正掌握这一正确而完备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忧国忧民，广为交友，联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他出身农民，深知农民疾苦，“一遇水旱，不觉心伤”。1917年夏天，他同肖子升等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走访了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村，他们帮助农民干活，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疾苦。次年6月，他又同蔡和森沿洞庭湖岸边各县农村，

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他感到社会考察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无字书，是了解社会不可少的基本功。通过社会考察，他加深了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城市，主办工人夜校，接触广大工人。据《一师校志》记载，他举出办夜校的四点理由：第一，社会中坚力量的工人农民大多数失学；第二，效法欧美普及教育；第三，夜校可作师范生的实习场所；第四，借夜校打破社会与学校的鸿沟。毛泽东特别强调第四点，认为学校是社会的局部；社会即学校，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夜校中，他亲自讲授历史课，目的是“粗养其历史观念及爱国心”。在教学中，他注意联系实际和改进教学方法。经过主办夜校，他同工人阶级建立了初步联系，加深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

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没造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毛泽东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皇帝可以打倒，民主可以建设，但归根结底要发动广大群众来做。为此，他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推翻反动统治的前提和基础。要想推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抚”，收到了“社会改革”的巨大胜利。又说：“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鸞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很深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民众大联合，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提出：“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

“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

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①

可见，青年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改造旧世界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发动群众改造中国与世界、组织人民大联合以及运用群众力量夺取政治权力等思想，这些观点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

上面所说三个方面与毛泽东所处的具体环境和个人品格有很大关系。首先他勤奋好学。能够在很短期间阅读大量古今书籍，并养成读报习惯，扩大视野，吸收了中外著名思想家的优秀思想。其次重视社会考察。他不仅重视书本知识，尤其重视向社会和群众学习，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他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再次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真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他追求真理和独立思考的过程。此外，毛泽东还有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别人长处等优点。在他宇宙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两次来北京，与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频繁接触，同在法国较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往返书信。这些都是促使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三

任何一个先进分子，要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同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彻底地决裂，才能达到质的飞跃。但不是任何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都能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虽然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不愿清理自己的旧思想，后来又倒退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但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彻底改造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根本途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正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

^① 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